

■活化利用

重庆涉外交往文物旧址的有效利用

颜毅 刘婧雨 魏婷婷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更加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高度关注中国内外政策发展走向及对世界的影响。重庆是世界公认的二战英雄城市,现存大量抗战时期的涉外文物旧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重庆由一个四川的省辖市,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是战时中国的外交中心。重庆自强不息的英雄城市本色也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24个国家的外交机构移驻重庆,发挥了重要外交功能。

政策制度保驾护航

在国家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从法律法规层面为重庆抗战涉外交往文物旧址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遵循。202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提出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突出了“有效利用”的重要社会价值。

在地方层面,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文物对外交流合作,实施重庆文物外展精品工程,加强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要求。《重庆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从规章制度方面进行明确和规范,保障工作落地实施。

加强保护,注重价值挖掘

重庆是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经初步统计,目前全市抗战时期涉外交往文物旧址29处。其中中国保18处,市保5处,区保4处,文物点2处。涉及国家有法国、苏联、美国、美国、韩国、德国、意大利、印度、土耳其、荷兰、丹麦、比利时、澳大利亚、西班牙;以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为主体,主要位于中心城区(渝中区、南岸区),基本保存较好。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与荷兰学者张克雷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一书中,首次呈现抗战时期涉外交往文物旧址中各国外交官当年生活状态,记录了二战时中国外交的关键时刻和精彩瞬间,展现了中华民族奋起救亡图存,重新确立其世界大国地位的进程,填补了对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球性角色研究的学术空白,为正在经历“重生”的涉外交往文物旧址注入了历史价值内涵。

有效利用促进功能升级、服务当代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用好涉外交往文物资源

左: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中英联络处旧址 李翔喧/摄
右: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苏联大使馆旧址 颜毅/摄

近年来,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旧址(重庆沈钧儒旧居)、中英联络处旧址、美国大使馆旧址率先有效利用,依托文物旧址开展科研展陈,创造条件主动对公众开放,推出“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中英联络处旧址影像纪念特展”和“中美同盟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影像展”,让公众了解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抗战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加强对外联络,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南方局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为中国共产党登上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行反映了南方局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如今回顾、梳理、展示这段历史,能够充分说明,即使在陕北高原,即使在十分艰苦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向世界开放的政党,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更是今天要保护和发扬的品格,可以激励我们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

中英联络处旧址采取多种形式活化利用,运用影像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等学术成果,以百年历史转变为线索,以城市与文物的关系为切入点,从宏观到微观学术转化、多元意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意识,让公众铭记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艰难岁月。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苏联的交往合作
苏联在重庆三处涉外交往文物旧址(苏联大使馆旧址、苏联大使馆官邸旧址、南山36号苏联大使馆旧址)见证了抗战时期周恩来与苏联驻华使节“共御寒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在苏联大使馆旧址留下足迹。1941年1月11日,周恩来出席《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庆祝晚会时获知皖南事变爆发,随即和叶剑英赶赴苏联大使馆,约见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告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就前往



苏联大使馆,会见了时任苏联大使彼得洛夫以及其他外国使节。

活化利用涉外交往文物旧址 澳大利亚、丹麦、土耳其公使馆旧址三处涉外交往文物旧址与公园环境完美融合,近年来围绕外事参访区建设,激活了涉外历史文物资源活化利用。

除渝中区鹅岭公园,法国、西班牙、英国、苏联、印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等涉外交往文物旧址还集中分布在南岸区内。1941年起,时任苏联大使潘友新住所及苏联大使馆郊区办公处就设在南山植物园内,故又称“潘友新故居”。附近还坐落着法国大使馆旧址、印度专员公署旧址、西班牙公使馆旧址。法国大使馆旧址、西班牙公使馆旧址目前被用作南山植物园科普教育展示基地,展示珍贵的植物标本。印度专员公署旧址如今已成为一座小型图书馆,收藏园林类图书上千册。德国大使馆旧址为中西合璧式建筑,位于南山的文峰塔下。此外,美国使馆别墅旧址、意大利使馆、比利时使馆等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打造成为适合承办多边国际会议的优质特色外事活动场所。

让重庆涉外交往文物旧址成为国际交流平台
自1939年抵达重庆,直到1946年离开,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整整7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处理中共外部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联系的主要窗口。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除与驻重庆的各国外交官进行定期联系,还与到访重庆的众多外国特使密切接洽。例如,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特使居里于1941年初首次到访重庆时,周恩来便与其进行了私人会晤,并向其出示了国民党反共的各类材料。

目前,重庆市29处抗战时期涉外交往文物旧址依据《文物建筑开放导则》,遵循正面导向、注重公益、促进保护、服务公众的原则。宋庆龄旧居暨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马歇尔公馆旧址、美国军事援华代表团驻地旧址(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涉外文物旧址,在提升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有效利用抗战时期涉外文物旧址,让重庆文化底蕴和独特人文气质交相辉映,是高品质建设开放之城、人文之城,推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让文物旧址有尊严地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国际交往的实践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美国大使馆旧址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遗产地居民参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思考

——以二里头遗址为例

李云方

大遗址是文化宝藏,蕴含着历史、科技、艺术、环境等价值,建设遗址公园是利用大遗址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方法。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曾发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活化利用指南》;土耳其奉行可持续的遗产保护政策,并使当地社区融入遗址保护实践;法国不再局限于对历史建筑的修复,而是致力于对历史地段的居民环境的改善及遗址的再利用。2000年中国批复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于2009年正式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提出“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两项主要任务。

二里头遗址居民现状观察

依托二里头遗址文化资源而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及公园是河洛地区的明珠。为进一步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大遗址内居民生活状况改善、遗址区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亟须解决。

为配合二里头遗址保护展示工作,二里头遗址部分居民实行了外迁。2017年开始,二里头遗址区的部分村镇居民响应号召,有序地迁出遗址区,距离他们搬离村庄已过去几年,他们未来的安置新居暂未全部落实。从长远来看,遗址区居民的房屋及耕地的搬迁和占用补偿多是短期性的给付,对于村民来说并不算长久的生计。而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及二里头遗址及周围环境的综合改善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群众基础。

遗址区保护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现阶段部分居民可以在二里头工作队、博物馆、遗址游客服务中心谋求一份工作,有的居民可以通过在遗址区附近进行小规模、流动性强的商品交易获得收入。总体来说,遗产对居民的良好贡献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但二里头遗址因年代较早,可视性有限,目前的展示处于较为传统和初级的阶段。可针对遗址博物馆开放以来的参观情况,进一步吸纳附近居民融入,增加相关教育培训。

尽管有人对居民参与遗址保护与发展持有一定的担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公众参与的积极意义。遗址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关系,正在经历着从冲突期到平缓期,再到共荣期的磨合,并将实现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与遗址区居民携手并进的美好未来。



可供居民休闲的景观大道



郭振亚展示考古学家赵芝莹的来信

参与二里头遗址保护利用的可行性

实现博物馆的公益性及遗址公园的共享、公园属性 博物馆的公益性体现在免费对外开放,满足公众学习、教育、休闲娱乐的需求。园艺学家陈植从公园设计的角度,定义公园“乃人生共同生活上依实用及美观目的,依设计土地,而供群众使用及享乐趣也”。张天活概括,二里头遗址“不再单单只是一处经过设计的景观,一份文化的载体,或者一个社会活动的容器,而是一种社会空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突出全民公益性。二里头遗址的博物馆、公园的保护展示从景观到社会空间的营造,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着很好的助益。加大对大遗址和遗址地居民关系的、研究,对实现博物馆的公益性及遗址公园的共享、公园属性有很大帮助。

丰富二里头遗址展示的内涵载体与特征 二里头当地居民有着自己的传统口头文学,是承载着乡愁的地域记忆,具有时代价值。早些时候关于二里头村名来源的故事有多种说法。老辈人称二里头为“二流”,有老人念过曲儿,“北伊河,南洛河,围住二流寨豁豁。红胡子,绿胡子,爬到寨上看柳树。刀客多,割耳朵,一下扔出寨豁豁。二流寨门水围着,血红淋淋找不着。”人围水源而居,那时候二流是有寨子的。寨子多防水患,有说法:“能往西挪一寸,不往东挪一分。西走步高,东走水壕壕。”这些地名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当地也有“夏商说日事,银条载其中”的民间传说。

关于二里头“树的乡愁”故事也有很多,四角楼的一株杨树矗立至今,像一个生态的“活坐标”记录了四角楼时空的信息,是剪不断的思乡根脉。一位老乡家的松树也曾为遗址公园增添一抹绿。

大遗址的内涵载体不仅仅是遗址本体,还包括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换言之,二里头遗址文化载

体的组成部分,除了大遗址本体及其学术研究外,还应包括与二里头遗址有关的民俗、传说、艺术作品等。目前中国社科院考古工作队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同时,也要结合文旅融合和研学的需求,加快考古成果的转化,助力遗址博物馆及公园的建设。

融洽遗址与社区居民共生关系 大遗址保护需要将遗址、文物及相适应的环境一起考量,确保遗址价值的完整和真实,实现遗址的整体性保护,促进遗址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遗址无言,遗迹遗物的阐释是考古学者的工作与智慧。透物见人,长期生活在这片文化热土的居民代代在此劳作,对这片土地有着自己的解读与传承。遗址地附近居民对博物馆及遗址公园的未来规划有着很大的期许,大部分民众支持遗址空间的建设。

如何协调遗址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控委会在社会治理中协调与传达民意的作用。此外,也应吸纳村内热爱文化遗产事业的知识型村民、有影响力的村民等非文博体制内的人员参与二里头遗址的规划建设,为保护利用发声。笔者通过对挖岗头村民郭振亚先生的访谈,初步了解到当地民众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发现并上交青铜器、三代考古队长的工作生活轶事,邀请许宏先生进行科普讲座等往事,被郭振亚娓娓道来。像郭振亚这样生活在二里头遗址上的“文博乡土专家”,理应被吸纳到遗址建设工作中来。

除了积极吸纳人员参与大遗址保护利用,还应积极完善社会参与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法规,让大众参与大遗址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积极尝试策划合理的激励政策与分配保障机制,让整体搬迁的民众能够顺畅过渡到新的生活中去。结合遗址地开展美丽乡村环境整治,文旅融合振兴乡村经济,建立与村民生计适配的遗产保护利用制度。

想要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二里头遗址,还需从二里头遗址的特征与文化载体出发,多考虑遗址地居民的问题,对遗址地居民多一点关怀,促使这些遗址与居民的关系更加融洽,形成一个良性的共生共荣关系。

(作者单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信息化建设

关于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思考

郭艳荣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西汉政权与西域各城郭联系,到西汉政府于公元前60年在乌垒(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逐渐将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自此以后,尽管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紧时松,但是仍然在此设置了管理机构,始终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新疆各族人民经过长时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资源。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位于亚欧大陆腹地,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周围与8个国家接壤,这些地区文化的发展与新疆密切相关,在新疆保留了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实物。发掘新疆文物资源的文化价值,对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极其重要。

新疆文物资源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疆文物保护成果丰硕。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11月15日公布的《新疆的文化保护与发展》白皮书显示,“新疆通过3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1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了文化遗产家底,截至2017年,全疆文物点9542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20处。文化文物系统现有博物馆92个(包括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地区博物馆2个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45万件/套。”还有与文物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已收藏的古代典籍文献包括汉字(汉文字、西夏文和契丹文等)、阿拉美文(法卢文、帕赫列维文、摩尼文和回鹘文等10多种)和婆罗米文字(梵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吐蕃文等)三大系统,共19种语言、28种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天文、数学、医学、艺术等领域。”2018年至2022年,累计出土文物近1.5万件。

此外,截至2022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尉犁晋国营遗址、若羌小风墓地、库车友谊路晋十六国砖室墓、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和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8项考古发掘项目先后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等国宝级文物,证实新疆自汉代就已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中。

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现状

新疆文物资源数量大、类型多、分布广,主要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经过70多年的积累,文物资源日益增多。通过对这些文物资源的普查,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基本摸清了自己的家底,但这些资源绝大部分还未进行有效的数字化开发利用。

就目前来说,文物资源的数字化首先是借助计算机存储功能,三维扫描设备、互联网等,将文物相关信息录入计算机,通过处理,将是文物承载的各方面信息永久保存。其次是互联网为媒介,借助大屏幕、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载体,实现文物资源线上浏览,构建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博物馆,实现博物馆之间文物资源共享。经过笔者的调查了解,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现状如下:

普查时建立的大量数据库,绝大部分还停留在数据库阶段,使用范围有限。不可移动文物方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汇集于自治区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由当时普查办公室统一管理,只在日常管理中应用,并未实现对科研和公众开放;可移动文物方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资料”采集了大量影像资料,对不同级别的文物进行了数字资料搜集,大量的处于影像资料保管状态。

文物资源资料系统之间不兼容,地州(市)、县级数据库使用频率低,仅限于对调查数据的搜索和统计利用。

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或云展览仍在探索阶段。目前仅有新疆博物馆的数字博物馆和石河子博物馆的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吐鲁番博物馆开展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开发了“丝绸之路带式互动展示系统”,和田地区博物馆编制了《和田博物馆数字化保护实施方案》,阿勒泰地区博物馆推出“通天洞遗址投影互动展示”,设立“智慧博物馆设备”,开发“VR云游博物馆”线上小程序等。绝大部分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数字化项目尚在探索之中。

考古发掘项目数字化工作仍处于探

索阶段。近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发掘项目日益增多。尽管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有条件的项目团队对遗迹、遗物及整个发掘过程进行了数字化采集,但由于考古发掘自身特点和成果转化的周期性限制,许多发掘项目数字化成果尚处于开展阶段,无法立即成批量转化成果以满足公众需要。同时,以往的档案资料仍以纸质档案为主。

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建设探讨

可分为三个阶段或者三种利用级别:首先,实现文物信息数字化输入,服务于文物行政管理;其次,实现文物信息使用数字化,服务于研究等;最终实现文物信息展示数字化。

第一步:实现文物资源数字化输入,服务于文物行政管理。文物资源数字化输入,即借助计算机、三维扫描等现代数字化技术将文物资源原始信息输入计算机程序。目前,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疆成果资料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新疆成果资料,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资料等,通过数据库连接,实现各级文物资源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互通共享。将自治区博物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治区文化遗产(文物古志)保护中心、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等自治区级文博单位申报的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项目、数字化项目,与各地州在中央资金、自治区资金或者自筹资金支持实现的文物、古迹的数据采集,最终实现信息数字化,在自治区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储备库,形成文物信息档案、文物保护工程档案以及文物管理档案,便于行政管理使用。

第二步:实现对全疆文物资源有效科学管理,服务于研究所、高校等机构。利用计算机管理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文物及遗迹进行分门别类,实现对全疆文物遗迹现状的监测管理,了解文物保存现状,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和结项情况,以及理论性研究情况。

新疆土遗址和木构建筑居多,有以交河故城、高昌故城为代表的古城遗址;以孔雀河烽燧群为代表的长城资源;以龟兹地区石窟、高昌地区石窟为代表的石窟群,因地环境的变化和人为因素,这些遗址面临自然和人为因素破坏的风险。以往单纯的纸质档案无法满足全方位的信息采集和全程跟踪监测变更,而通过信息数字化能够确保土遗址资料的完整采集,为复原提供基础资料。

第三步:实现文物信息展示数字化。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将馆藏文物、遗址、博物馆展览以数字化形式展示出来,走进乡村、校园、机关,通过网络,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实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资源共享。

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预期

对新疆文物资源实现数字化,首先,能够实现对文物档案的数字化管理,确保文物档案的永久性;其次,能够实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文物现状的监测;再次,实现对文物保护单位项目和工程的监管;最后,在保护文物资源的同时,实现文物资源的展示和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青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青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瑞霞针对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标准认识不一,文物工作者和数字技术人员缺乏对此业务的了解,计费标准缺失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建议,即以建立文物档案为目标,以文物考古工作为标准,建立“多合一”的文物数字化保护体系,强化文物基础性工作;研究制定文物数字化计费标准,使这项工作列入预算时有章可循;强化文物数字化保护培训,让文博工作者了解文物数字保护的基本常识,使文物数字化保护成为由文博单位主导、多学科广泛参与的文物基础工作,真正实现文物保护的目标。”

而对于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目前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规范化和标准化。这是数字化管理的前提条件。当下,文物资源数字化正处于探索阶段,还在摸索文物资源信息搜集的规范标准。各地方文博单位均依据自己的构想与数字化公司合作,现在亟须由自治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甚至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出台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确定数字化人才。在选择文物档案及信息处理过程中,需要确定数字化人才,设定数字化资源分级利用的权限,防止超范围信息的泄露,保障学术成果原创性和知识产权。

新疆文物资源数字化的实现,有助于文化润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疆各族民众日常生活,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